

1954—1956年间的《长生殿》讨论： 爱情主题说及其批判

陈宛希

(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29)

摘要:建国以来开展的思想运动和新文艺观的确立,对开始于1954年的《长生殿》讨论产生了深刻影响。而讨论伊始即对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爱情主题说”进行批判,并将其提升到“资产阶级思想”的高度,则多少偏离了学术讨论的常态。从这个角度看,1954—1956间的《长生殿》讨论虽然不能说已具有了“思想事件”的性质,但却透露了向这种性质演变的迹象。

关键词:长生殿;爱情主题说;学术事件;思想事件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2)05-0022-09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时值救亡与启蒙交织之际,无论文学艺术,还是思想学术,都不免受到政治的巨大影响。文艺学术与政治的这种关系,在新中国建立后没有改变。1950年,《文艺报》第2卷第4期《编辑部的话》即强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乃是“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中心的问题。文艺批评的开展与文艺理论的建设,主要依靠这一中心问题的正确解决”。解决之道就是遵循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陈伯达就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1](16)}。周扬也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1](70)}作家要创造富有思想性的作品,“必须首先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各种基本政策”^{[1](91)};文艺批评则“必须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之具体应用”,而批评乃是“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1](96)}。沿着这一方向,革命战争年代开始形成的关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强调文艺的倾向性、阶级性、意识形态性等思想,尤其是列宁关于文艺的“党性原则”的论述^{[2](663)}和毛泽东着重强调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思想^{[3](866)},随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普及与政治运动、思想运动的不断开展,在文艺领域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建国以来政治对文艺与学术的深远影响,其性质不能一概而论。例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确立及与之相应的文化政策的推出,就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当然也无庸讳言,在“左”倾思潮影响严重的时期,政治常常直接干预文艺批评与学术讨论,以致一些旨在解决学术问题的“学术事件”往往“升格”为重在解决思想问题的“思想事件”乃至性质更为严重的“政治事件”。这表明,在中国,文艺与学术不能也不可能脱离政治,但二者之间保持一种恰当的关系,却是文艺与学术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

1954年发端的《长生殿》讨论置身于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与思想氛围,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后者

收稿日期:2012-08-21

作者简介:陈宛希(1988—),女,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戏剧戏曲学研究生。

的深刻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构成了建国以来思想史与学术史的一个特定的部分,其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也具有复杂的性质。有鉴于此,本文不打算对这一时期的《长生殿》讨论进行全面的述评,而拟将其视为思想史中的“学术事件”和学术史中的“思想事件”来加以考察。

一

1954年是不平静的一年。这一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正式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诞生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我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这一年也是洪昇逝世250周年。为此,中国作协提出举行纪念活动。有关洪昇主要作品《长生殿》的讨论就是在这背景下展开的。

《青岛日报》1954年3月23日刊发的关德栋撰写的《洪昇和〈长生殿〉》,一般被视为建国以来第一篇讨论《长生殿》的文章。这篇千余字的纪念性短文认为《长生殿》“用正面事实”描写了李隆基和杨玉环之间“异常真挚诚挚”的爱情,写出了“杨玉环的痴情和李隆基的钟情”。^[4]同月,关德栋受时任山东大学副校长的陆侃如与冯沅君之托,在中文系纪念洪昇逝世250周年的纪念报告会上发言,同样肯定《长生殿》表现了李隆基、杨玉环的真挚爱情,认为杨玉环是“一个善良、温柔、痴情,同时也是聪明、坚决、勇敢的妇女形象”,而李隆基则是“一个热情的男人”;戏曲以“李隆基进入月宫与杨玉环去重圆”结束,“强烈地表现了封建社会妇女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不可征服的意志,简直可以说是表现了爱战胜了死”。^[5]这被认为是提出了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爱情主题说”。

关德栋的短文和发言引起了“不少同志的不少看法”^[5]。为此,山东大学中文系于4月30日就关德栋的报告和文章召开了讨论会。按照《青岛日报》6月30日刊发的署名“方征”的报道(以下简称“方文”),这次讨论会“事先进行了酝酿、准备”^[5]。不过,虽然该校科学研究委员会特别要求必须掌握“就事论事”和“自由讨论”的原则,但在周来祥看来,“两种相反的意见,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讨论,就以关德栋先生‘承认了自己看法的片面性’而告结束。”^[6]关德栋的学生刘光裕则直指“洪昇纪念会变成了针对关先生的‘批判会’”。^[7]

6月3日、30日,《光明日报》和《青岛日报》分别介绍了这次讨论会。前者基本上是客观报道,较为简略,后者则较为详细。需要注意的是,《青岛日报》在报道前加了具有明确导向性的“编者按”。这个“编者按”对该报先前发表关德栋的文章作了自我检讨,并直接批评这篇文章“对于‘长生殿’一书的人民性的分析,和对这一著作的价值的论述,是不充分的。其中有些论点,也不恰当”^[4]。官方日报这个兼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按语,多少有些不同寻常。

从“方文”可知,山东大学中文系4月30日的讨论会,是专为关德栋在纪念会上所作报告而召开的。不过,虽然批评的对象相同,批评者的角度、理据和程度却有所不同。刘泮溪认为,一夫多妻制的封建婚姻制度不可能使封建主有真正的恋爱,关德栋的“爱情说”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说不过去。琦书畊、殷焕先、袁世硕等也否定李、杨爱情说,认为李隆基不过是“逞侈心”,杨玉环则只是“穷人欲”,所言之情无非荒淫无耻、争宠妒忌之情。吴大琨则认为《长生殿》暴露了当时封建统治内部的矛盾、腐败和荒淫无耻,把“长生殿”看作是描写“真挚爱情”的作品,是不妥当的。孙思白也不同意关德栋对李、杨的肯定。在他看来,《长生殿》描写的悲欢离合本身便反映了当时天宝年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冯沅君代表中国文学史教研组的发言则较委婉,她不同意关德栋把“描写一个生死不变的爱”放在洪昇创作动机的“第一位”而忽视了《长生殿》的现实主义内容。^[5]但她在强调《长生殿》深刻反映了洪昇民族意识的同时,也指出作者的“写作动机是错综复杂的,真挚的爱与民族意识有机的结合在一起”^[8],这就以写作动机复杂性的名义为《长生殿》的爱情描写保留了一席之地。

讨论会的发言文本已难找到。从《光明日报》和《青岛日报》的报道来看,讨论会前后,在《长生殿》思想主题问题上,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作为批评对象的关德栋的“爱情主题说”,二是作为批评话语的“政治主题说”(即“方文”中所概括的两种:揭露封建王朝崩溃时的情景及反清意识),三是介于其间的

反映作者思想矛盾的动机复杂说(既有写爱的成分,也有垂戒的成分)。显然,掌控话语权的是批评性话语,尤其是政治主题说。

按照《青岛日报》的报道,山东大学中文系的讨论会“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被批评者“也承认了自己看法的片面性”。

具体考察一下,讨论会上所达成的“基本一致”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在思想理论层面取得了共识,其中主要就是“方文”中所说的: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爱,而没有超阶级的爱,“爱情战胜了死”,正是一种资产阶级“恋爱至上”的观点;其次是批评实践的层面,即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运用于《长生殿》研究,因此否定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李、杨之间有任何真挚诚挚的“爱情”。而对于《长生殿》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内容,则“大体上没有多大的分歧”。

讨论会上取得的理论上的“共识”,实际上也意味着对“爱情主题说”的批评开始超越学术批评的范畴,而进入了思想批判的领域。要知道,建国以来开展的各种思想运动,主要批判对象之一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从这个角度看,被视为宣扬超阶级之爱的“爱情主题说”的出现,显然很不合时宜。

这表明,经过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文艺界与学术界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已有了新的认识,强调政治标准、坚持政治正确已成为文艺批评和学术讨论的重要原则。而“政治正确”,最基本的就是坚持人民性和阶级性。以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人民性、现实主义、典型理论、反映论等为核心的新文艺观被普遍接受。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这一时期包括《长生殿》讨论在内的文艺批评何以特别关注作品的思想内容及作者的社会身份和思想属性,而极少进行艺术方面的探讨。显然,只有前者才是最能体现新文艺观的研究领域。从这个角度看,《长生殿》讨论并非特例,类似个案在当时的文艺界、学术界并不少见,在接下来的年代里更是屡见不鲜。

二

关德栋的观点一提出即受到一边倒的批判,甚至被指责为“资产阶级‘恋爱至上’的观点”。此后三年间,爱情主题说几乎完全失声。在这一时期,有关《长生殿》的讨论几乎都集中于思想内容和思想主题,并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即政治主题说与复杂主题说。这两种主题说都由爱情主题说所激发,都对后者提出了程度不同的批评,而后者却未能提出申辩。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场被批评者缺席的批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场讨论没有学术意义。实际上,由爱情主题说引发的《长生殿》讨论虽然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并由于主角的缺席及个别言论的上纲上线而不无遗憾,但多数论者在讨论中仍然坚持了学术讨论的学理性,从而推动讨论向纵深发展。

在《长生殿》讨论中,“政治主题说”是“爱情主题说”的主要批评者。持此说者认为《长生殿》的主题不是“爱情的”而是“政治的”,他们主要运用的是阶级分析法。

“人民性”与“阶级性”并非同一概念。如所周知,经过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文艺批评已经确立了“人民性”的基本原则。但无论是理解还是运用,在不同的论者那里都有所不同。就此一时期的《长生殿》讨论来看,在主题问题上持不同观点的论者,在坚持“人民性”这一原则上,是基本一致的。但有的论者在较宽泛的意义上理解这一原则,即以反映人民的意愿、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来理解人民性,因此主张正确评价封建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认为这些作品虽然并不直接反封建,但却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愿,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他们以这种宽泛意义上理解的“人民性”来考察《长生殿》,从而肯定了作品中的爱情描写,认为作品中所描写的统治阶级中的爱情,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和期待,符合于人民大众的审美需求。与之相反,一些论者则从阶级性角度来理解“人民性”,强调人民性中的阶级性因素和爱情的阶级性,因而否定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山东大学中文系讨论会上一些批评者就基于文艺批评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方法,认为封建统治者“根本谈不上什么‘恋爱’问题”,他们有的只是“逞侈心”、“穷人欲”。

但政治主题说作为一个方便而笼统的说法,实际上包含几种不同的解说,这在其以后的发展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这一时期的主要提法则是表达作者的政治批判意识或“民族意识”、“爱国主义”。

在山东大学中文系的讨论会上,袁世硕否定作品中杨玉环的“痴情”和“善良”,认为她不过是沉溺于宫廷腐化生活,试图巩固杨家的地位。会后又发表了《试论洪昇剧作〈长生殿〉的主题思想》一文^[9],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一方面重申此前对爱情主题说的批评,认为宣扬李、杨之间“真挚诚挚”的爱情,乃是“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主义和超阶级的‘人性论’的观点”。另一方面则肯定洪昇不仅反对封建传统的“女色亡国”论,而且突破了抽象的“情”的观念,“藉以抒写抑郁在胸中的亡国之痛”、“兴亡之恨”。文章将《长生殿》一分为二,肯定前半部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剧作,后半部则由于作者的封建思想和唯心的“情”的观念上升为主导地位而坠入于虚幻,因此是失败之作。并强调洪昇的伟大,不在于他如何解释封建王朝崩溃的原因,而在于描绘出了封建王朝的一些政治面貌。

1954年7月2日和4日的《新民报晚刊》连载了左明的《〈长生殿〉的人民性》^[10],作者也认为《长生殿》虽以唐明皇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但其“主旨却是借此敷演国家大事、发抒国家兴亡的感慨”。在作者看来,《长生殿》在异族统治的时代,取材历史的兴亡,而促起人民对祖国的怀念,因此“深刻地表现了它的人民性,是可以归入爱国主义的范畴的”。不过,虽然作者在《长生殿》主题问题上与袁世硕基本一致,但在批评“爱情主题说”的同时,并没有否定作品中的爱情描写。

熊德基的看法与左明相近,他的长文《洪昇生平及其作品》^[11]对洪昇生平及作品进行了全面考察。根据这种考察,他认为,在洪昇生活的年代,“阶级矛盾的主要形式已转化为民族斗争”,洪昇一生经历了从火热的抗清运动到异族统治巩固的整个过程,而其父的遭戍和自己的遭遇都是这一斗争的直接结果,因此,占其思想主要地位的是爱国主义。虽然《长生殿》描写了李、杨爱情,但不过是借助爱情故事来反映当时的现实和作者的感受。“憎恶异族统治,怀念故国,讽刺宫廷的淫佚,指责官吏贪残,同情妇女的命运”,就是贯穿其全部作品的主导思想。

需要说明,《长生殿》讨论中虽然出现了爱情主题说与政治主题说的分歧,但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爱情主题说只看到爱情,政治主题说则只强调政治。作品的思想主题不等于作品的思想内容。事实上,论争双方都看到了《长生殿》思想内容的复杂性,他们的分歧主要不在作品的思想内容而在思想主题。即以《青岛日报》发表的、后来饱受批评的关德栋短文来看,关先生虽然认为《长生殿》主要写的是李、杨“恋爱故事”,但并没有否定作品所体现的“人民性”。他不仅指出杨玉环的痴情反映了“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受极度压抑而寻求解脱的心情”,“雷海青、李龟年这样人物的歌唱”则“表现了人民的心理”,而且强调《长生殿》“主要就是由于它与人民的思想感情有着联系,所以才为人民保留了下来”。^[4]从这个角度看,他的“错误”并不在于其看法中缺乏人民性,而在于没有把阶级性、人民性作为最高的、唯一的批评原则并贯彻到底,以致“爱情主题”掩盖了“阶级话语”,从而未能保持其《长生殿》研究的“政治正确”。同样,批评者一方,也并非全都简单地否定剧中的爱情描写,一些论者(如左明、熊德基等)只是不同意把爱情描写作为作品的主题。

爱情主题说与政治主题说虽然旗帜鲜明且持之有据,但无论是《长生殿》剧情本身,还是作者洪昇对自己创作动机的表述,都显示了问题的复杂性。在这里,主题的单一与问题的复杂,其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有鉴于此,一些论者别辟蹊径,提出了复杂主题说或双重主题说,试图解决作品思想内容及主题的复杂性问题。

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讨论会上,冯沅君已经指出了洪昇写作动机的复杂性,认为“真挚的爱与民族意识有机的结合在一起”^[8],试图以作家写作动机的复杂性来调和“爱情主题说”与“政治主题说”。但其论说未能展开。这种情况后来有所改变。

邵曾祺与宋云彬都承认《长生殿》思想内容的复杂性。前者强调《长生殿》前后两部分在风格、题材来源、主题思想和文学成就上“都是截然不同的”,既承认作品中的爱情描写,认为“我们一方面对这两个人的纵欲享受固然还是深刻的不满,但是一方面对这两人的爱情又不能不加以同情”^[12],也肯定了作品对统治阶级腐朽堕落的揭露和谴责,表明了作者的人民性立场。后者^[13]同样认为《长生殿》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既“着重写杨贵妃和唐明皇的生死深情”,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揭露了唐帝国的祸乱之机,并流露出了作者洪昇的民族意识,“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而在杨玉环问题上,宋云彬特别强调了洪昇对白居

易《长恨歌》的继承,认为《长生殿》突破了传统文人的“红颜祸水”观,着重写李、杨的生死深情,而“没有把祸乱责任推给杨贵妃”。这种处理符合于人民的看法和审美要求。但对作品主题,邵、宋都未提出明确的意见。

钱东甫看法有所不同。他的《关于洪昇和他的戏曲〈长生殿〉》^[14]一文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褒杨贬李,强调李、杨爱情的矛盾和非等值性。作者不同意《长生殿》表现了唐明皇“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而将作品置于明末清初“浓厚的民主主义倾向”的思想背景中来考察,认为剧中的杨贵妃即是这一思想倾向的反映。她不再是“乱阶的尤物、倾国的祸水”,而是“人民心目中的一个真实的贵妃”,其对爱情的追求是“诚挚、专情”的。与之相反,则是“好色的、性格软弱而自私的明皇”。按照这种说法,《长生殿》描写的爱情,实际上只存在于杨妃身上,因此是单向的。二是认为《长生殿》不仅描写了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而且“试图接触和追究”作为故事背景的安史之乱的原因;洪昇对人物正确的现实主义处理态度、对历史事实的深刻理解、对统治阶级罪恶的暴露与指斥、隐约流露出来的民族意识,以及高超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手腕,生动地表现了这一历史的爱情的悲剧。

此时期陈友琴除撰有两篇有关洪昇生平的考订文章(即先后载于1954年6月21日、10月24日《光明日报》的《略谈〈长生殿〉作者洪昇的生平》及《关于洪昇生年确证的补充》),还发表了《读〈长生殿〉传奇》^[15]一文。这篇文章并不否定《长生殿》是言情之作,但不同于关德栋等把剧中的“情”解释为爱情,而将其解为“天地间之情”：“男女爱情固然是情,臣忠子孝也是情”。正是基于这种宽泛的理解,文章既反对把《长生殿》主题说成是“爱情战胜了死”,也不同意一笔抹煞帝妃之间的爱情;既认为“爱情的确是《长生殿》的主题”,又认为洪昇所讲的“情”绝非这么狭窄,围绕这个男女恋情“而产生的一切矛盾和斗争关系到千千万万的人民生活,这才是本书的主题”。但是,《长生殿》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极为复杂,《长生殿》的主题到底是要揭示哪些矛盾和斗争,两个主题之间是什么关系,陈文并未给予明确的界说。不过,从总体看,作者更强调政治主题。

对复杂主题说加以明确、具体而深入阐说的是程千帆。

关于1954年以来一年多的《长生殿》讨论,程千帆作了批评性的总结。在《论〈长生殿〉的思想性——对目前有关〈长生殿〉评论的商榷》^[16]一文中,他对此前讨论中的几种观点都提出了批评,认为此前论者在《长生殿》思想性问题上出现的诸多分歧,主要在于《长生殿》本身的复杂性。在他看来,交织在《长生殿》中的重要矛盾有三对,即李、杨的恋爱纠葛,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剥削,藩将安禄山对李唐皇朝的叛变和对汉族人民的残害,贯串全剧的线索则是李、杨的恋爱纠葛。抓住这“三对矛盾和每一对矛盾的两个矛盾面彼此之间的发展变化,乃是理解这个剧作的基本关键”。按照这个标准,只强调李、杨恋爱这条主线,显然是“表面的和片面的,它阉割了《长生殿》主要的思想内容,使它降低到一个一般的爱情剧本的地位”;只强调后两对矛盾,“则是孤立的和机械的”,它将否定《长生殿》艺术上的完整性。同时,认为有关封建统治者的爱情描写都不真实、《长生殿》描写的爱情乃是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观点的产物,也不妥当。虽然爱情至上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上“从来没有听说过”,但“在风流逸事中,或在毫无顾忌的被压迫阶级中”,还是“有这样的事情”,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存在着互相对立又互相影响的矛盾关系。文章不仅对作品中的爱情描写作了辩护,认为这是洪昇从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为了使作品所描写的爱情更容易感动人,在艺术上是必要的,也对为一些论者所非议的李隆基作了同情的理解,认为指责他好色、自私、不专一,“既不与历史的事实相符合,也不与作家的本意相符合”,并以“马嵬兵变的正义性”肯定了李隆基“割恩正法”的合理性。

程千帆的文章致力于从作品思想性的角度来理解《长生殿》的思想主题。在他看来,“《长生殿》从头至尾以较多的篇幅描写了李、杨二人生前死后的恋爱纠葛,而又通过这条线索,反映了当时所存在的巨大的、带有根本性质的社会矛盾。因此,说它不是一个以恋爱为主题的戏曲,是与事实不符的,而如果认为它的主题限于描写恋爱,也同样不对。”这就是说,《长生殿》的主题是复杂的而非单一的。不仅如此,他还把作品纳入杜甫、白居易以来“通过李、杨的恋爱纠葛以反映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来强调作品的统一性,认为无论剧中描写的历史现象多么复杂矛盾,但洪昇的态度是鲜明的、统一的,他“唯一的意图就是要以爱国主义来反对反爱国主义”。

这样,程千帆就以思想内容和主题的复杂性容纳了“爱情主题说”,并对其作了独特的诠释。但是,他所说的爱情乃是《长生殿》作者洪昇“赋予”李、杨的“爱情”,即艺术创作中的爱情。与袁世硕等一样,程千帆也认为统治阶级中“真挚、诚挚、专一的爱情”“在客观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他强调不应简单地否定剧本中的“爱情”,而应当研究“作家根据一些什么条件”赋予李、杨以真实爱情的原因。在他看来:“古典作家们为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危害祖国而谴责他们,又为了女性遭受牺牲而同情杨贵妃,为了祖国遭受侵犯而同情唐明皇。这就使得谴责和同情这两种似乎是矛盾的感情在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的基础上获得了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民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看法。”

简言之,在程千帆看来,尽管《长生殿》的创作动机、思想内容是复杂而矛盾的,其主题具有双重性,但这些复杂矛盾的方面并非没有统一性,其统一的基础就在于洪昇“异常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而这正体现了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和作品的人民性。

论者一般都把程千帆的观点划归于“双重主题论”,这种界定当然是有根据的,但也不能无视其更强调政治性的一面,因为无论是对洪昇创作动机的分析,还是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考察,程千帆强调的都是其所体现的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并以这种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为作品整体统一性的基础。

程千帆的文章具有很强的学理性和阐释力,体现了当时《长生殿》研究所达到的较高的学术水平,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吉林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后来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稿(清及近代部分)》,即认同于这种双重主题论,不过更强调爱情主题,将其视为作品的“基本主题”。^{[17](28-32)}

与程千帆观点相近而又有所不同的是徐朔方。

徐朔方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多篇有关《长生殿》的文章。在《〈长生殿〉的作者怎样向在他以前的几种戏曲学习》^[18]中,他运用“人民性”原则来解释《长生殿》,认为《长生殿》的独特成就在于“成功地表现出它所反映的那个历史时期的整个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以及宫廷贵族的荒淫腐化和人民苦难的尖锐的对比”,这种对历史的看法、对人民的态度又是与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而在《从〈长恨歌〉到〈长生殿〉》(《文学遗产选集》第一辑,作家出版社,1956),尤其是《洪昇和他的〈长生殿〉》^[19]中,徐朔方肯定了《长生殿》对李、杨爱情的描写,认为其有一个发展过程:《密誓》前唐明皇的感情比较浮浅,《密誓》有了新的进展,而马嵬驿事变则为其对杨贵妃的爱情“带来了决定性的转变”。在他看来,《长生殿》描写的唐明皇对杨贵妃的爱情是真挚的。

与程千帆一样,徐朔方也认为作品中描写的爱情并非真实的历史人物李隆基和杨玉环的关系,而且爱情描写也不是《长生殿》的唯一主题。他认为,《长生殿》不仅把李、杨爱情故事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把这一故事的背景写成了真实的历史剧的规模。这就是说,《长生殿》不仅有爱情主题,还有历史主题,即反映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揭示了宫廷贵族的荒淫腐化与人民的苦难,同时包含着国破家亡后的种种感慨。这正是《长生殿》超越它之前同一题材的几种作品的决定性因素。

不过,徐朔方虽然像程千帆那样强调《长生殿》思想内容的复杂性,却不认同于作品思想内容的统一性。在他看来,作品的爱情描写与历史描写虽然同样杰出,但在内容上彼此矛盾,因为“历史主题不能以传说的面目来处理,反过来,李、杨爱情传说和历史真实也是不相容的”。而洪昇受到题材本身演变的限制,未能完全解决这个矛盾。

由上可知,上述论者在强调主题的复杂性上是一致的,但对这些主题之间关系(矛盾的还是统一的)的理解上则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这个时期有关《长生殿》的讨论基本上局限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主题,主要观点即如上述。

从创作论的角度看,作品主题与作者写作动机有关,是作者“赋予”的。但一部优秀的作品,作为形象思维的产物,其思想往往并不局限于作者所欲赋予的主题。而从诠释学和接受理论的角度来看,则有个读者或观众参与的问题。正是这种带有读者或观众审美经验的参与,使作品的“思想”或“意义”呈现为一个开放的、无限延展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有关《长生殿》的各种解说,都构成了这个动态过程的组成部分。因此,无论从创作论还是文本论、接受论的角度看,都应当承认各种理解和诠释存在的合理性,没有必要非此即彼,更不能以文艺与学术之外的因素(无论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来强求同一。当然,要形成这样的局面,首先得取决于宽松的思想环境和学术氛围。

三

纵观此一时期的《长生殿》讨论,虽然批评的话语时有尖锐,个别论者也不免有上纲上线之嫌,但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平和的,学理性也较强。尤其是联系到建国以来发生于文艺界的那些影响深重的思想运动,就更是如此。

在电影《武训传》批判中,《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发表的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修改过的社论明确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承认对武训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20](316-317)}同年10月,中央发动了“直接目的是清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同时也对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给了初步的批判”^{[21](65)}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又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关于这次批判,毛泽东针对《文艺报》编者案的批语明确指出,这不是对《红楼梦》的理解是否“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22](570)},即开展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22](574)}。此后,不仅俞平伯受到批判,而且波及到先是拒绝发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而后转载时又加上编者按的《文艺报》,主编冯雪峰作了检讨,《文艺报》亦被改组。接下来的两个月,全国知识界几乎都卷入到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中,召开了多次批判会,发表了许多措词严厉的批判文章。随后,这场批判很快发展为中宣部报告中所说的“作为我党领导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思想战斗”^{[23](563)}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最后成为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对“唯心论影响”的全面清算。

关于文化学术领域中开展这些批判的性质和意义,中共中央作了明确的说明:“在学术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化了的表现,所以决不能认为,在学术问题上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只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批判的目的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得到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学会在实际生活中向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21](66)}

这表明,建国以来学术领域中开展的批判运动并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严重的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因此其解决方式也不能不是非学术的。对此,《武训传》批判就是第一个例子。《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党的生活”栏发表评论说,“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自我批评”,而那些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尤其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干部,“还要作出适当的结论”。至于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后来被胡绳直斥为对俞平伯的“政治性的围攻”。^[24]而“胡风问题”由1952年的宣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文艺上的小集团,演变为1955年的“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25](153)},其牵连之广,打击之众,影响之深,就更不待言了。从这个角度看,从1951年批判《武训传》到1965年批判《海瑞罢官》,的确“无不是从文艺批判开始而引发为政治运动,最终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文艺问题”^{[26](719)}。这一趋势发展到“文革”而达于极致,以致“学术事件”完全消隐。

从事件史的角度来观照建国以来的学术史,我们可以将其间发生的有关学术问题的重要论争大致归结为三种“事件”,一是以学术方式进行的、旨在解决学术问题的“学术事件”,如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所展开的有关现实主义、典型、形象思维等问题的学术讨论;二是将文艺问题、学术问题视为思想问题,以思想斗争的方式进行的、旨在解决思想问题的“思想事件”,如1954年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和随后开展的胡适思想批判;三是文艺问题、学术问题与思想问题逐渐演变为政治问题,最终以政治手段加以解决的“政治事件”,如1955年的胡风案和1962年的被称为“反党小说”的《刘志丹》案。

显然,与上述“事件”中的受害者相比,1950年代《长生殿》讨论中的被批评者“作为左倾教条的无辜受害者”,虽然受到的“伤害很重”^[7],相对来说又算是很“幸运”的了。

实际上,在洪昇逝世250周年之际引发《长生殿》讨论轩然大波的“爱情主题说”,只是出现于关德栋应邀在一个校内纪念报告会上的发言,而其公开发表的文字,也不过是《青岛日报》刊登的寥寥千余字的纪念性短文。从学术角度来看,其观点还没来得及展开论述,可以说只是提出了一种有待论证的观

点。但就是这样一个有待论证的、尚未为讨论者或批评者提供可资讨论或批评的充分材料的观点,一露头即受到了一边倒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中,被批判者没有申辩的机会。“爱情主题说”在此后的三年中销声匿迹,成为一个缺席的“被告”。这显然偏离了学术讨论本应具有的“百家争鸣”的常态。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并非如上述《武训传》等批判那样来自于政治方面的直接干预,而可能更多地源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思想氛围对参与者心态的影响,以及建国以来大规模开展的思想运动在知识分子世界观、文艺观和方法论上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在这里,最重要的不是“爱情主题说”是否成立或其对错,而是其是否拥有自由表达、自我辩护的学术权利。

从这个角度看,1954到1956年间《长生殿》讨论中对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爱情主题说”的批判,虽然不能说已具有了“思想事件”的性质,但讨论中出现的将批评对象提升到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观”和“人性论”的高度进行批判,却显露了向这种性质演变的迹象。到1957年,重新露头的“爱情主题说”才在周来祥、徐文斗的文章中得到全面的展开和具体的阐述。他们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关德栋的观点,而且在“双百方针”提出和文化政策调整而形成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及文艺理论界趋于活跃的思想氛围中(1957年初,巴人发表了对文艺与人情、人性、阶级性及其相关关系作了简略而深刻论述的《论人情》^[27],钱谷融稍后发表了《论‘文学是人性’》^[28]的著名论文),还试图运用典型论和人性论为“爱情主题说”提出理论辩护,并批评山东大学中文系关于《长生殿》的讨论“说明了庸俗社会学在我们古典文学研究中流毒之深”。^[6]但他们对“爱情主题说”的这种展开和辩护,在把《长生殿》研究推向深入的同时,也导致了更为激烈的论争。这种论争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反右运动的开展而逐渐变味、升级为思想批判,他们的文章被指责为“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贩卖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批判者们要求“在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进一步深入的今天……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清除它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恶劣影响”。^[29]正是在这种批判中,《长生殿》讨论终于由旨在解决学术问题的“学术事件”演变为兼具了重在解决思想问题的“思想事件”的性质。更严重的是,在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这种演变并不仅仅发生于有关《长生论》的讨论之中。这一切,值得治思想史者深长思之。

参 考 文 献

- [1]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C]. 1950年3月.
- [2]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 列宁选集(第一卷)[Z]. 人民出版社,1995.
- [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Z]. 人民出版社,1991.
- [4] 关德栋. 洪昇和《长生殿》[N]. 青岛日报,1954-3-23.
- [5] 方征. 关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对《长生殿》的讨论[N]. 青岛日报,1954-6-30.
- [6] 周来祥,徐文斗.《长生殿》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J]. 文史哲,1957,(2).
- [7] 刘光裕.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悼念吾师关德栋教授[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f28e16f0100uvgn.html.
- [8] 山东大学中文系讨论洪昇与《长生殿》[N]. 光明日报,1954-6-3.
- [9] 袁世硕. 试论洪昇剧作《长生殿》的主题思想[J]. 文史哲,1954,(9).
- [10] 左明.《长生殿》的人民性[N]. 新民报晚刊,1954年7月2日、4日.
- [11] 熊德基. 洪昇生平及其作品[J]. 福建师范学院学报,1956,(1).
- [12] 邵曾祺. 洪昇的《长生殿》传奇[N]. 新民报晚刊,1954年6月30日、7月1日.
- [13] 宋云彬. 洪昇和他的作品《长生殿》[N]. 解放日报,1954-7-4.
- [14] 钱东甫. 关于洪昇和他的戏曲《长生殿》[J]. 文艺月报,1954,(8).
- [15] 陈友琴. 读《长生殿》传奇[N]. 光明日报,1954-9-21.
- [16] 程千帆. 论《长生殿》的思想性——对目前有关《长生殿》评论的商榷[J]. 文艺月报,1955,(4).
- [17] 吉林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 中国文学史稿(清及近代部分)[M]. 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
- [18] 徐朔方.《长生殿》的作者怎样向在他以前的几种戏曲学习[N]. 光明日报,1954-8-15.
- [19] 徐朔方. 洪昇和他的《长生殿》[A]. 戏曲杂记[C].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 [20]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二)[C].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 [21]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六)[C].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2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四)[C].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 [23]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十)[C]. 国防大学内部出版,1986.
- [24] 胡绳. 在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会上的讲话[J]. 文学评论,1986,(2).
- [25]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五)[C].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 [26] 张炯主编. 新中国文学五十年[M].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 [27] 巴人. 论人情[J]. 新港,1957,(1).
- [28] 钱谷融. 论“文学是人学”[J]. 文艺月报,1957,(5).
- [29] 刘天成. 批判《〈长生殿〉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一文中的“人性论”观点[J]. 山东文学,1960年10月号.

On The Palace of Eternal Youth from 1954 to 1956: Love Theme and its Criticism

Chen Wanxi

(Institut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rama,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movement of though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literature's view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Palace of Eternal Youth* in 1954.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iscussion, when love theme was still at its budding stage, criticizing and even raising it to the height of bourgeois ideology, has somewhat deviated from the normality of academic discussion. From this aspect, although we cannot say the discussion from 1954 to 1956 has already possessed the nature of “ideological event”, it certainly has revealed some signs of evolution to this nature.

Keywords: *The Palace of Eternal Youth*; love theme; academic event; ideological event